

國恥癡情兩淒絕： 林譯小說《不如歸》的國難論述與情感想像

潘少瑜

《不如歸》是日本作家德富蘆花(1868-1927)的成名作，也是明治時期最暢銷的通俗小說，出版後隨即被譯為各國語言，風行全世界。《不如歸》的首次中譯是由近代著名翻譯家林紓(1852-1924)和魏易(1880-1932)合作，以鹽谷榮的英譯為底本重譯，於1908年出版後即引起熱潮，其後一個多世紀陸續出現各種中譯本，足見此書廣受大眾歡迎，歷久不衰。

夫妻情愛與家國意識是《不如歸》的兩大主題，書中描寫一個家庭的悲劇，並夾敘甲午海戰的場景，對於傳統家庭對夫妻情愛的壓迫提出血淚控訴，並以家國大愛作為情場失意者最後的寄託，其內容不僅跟漢樂府〈孔雀東南飛〉屬於同類故事的主題變奏，在人物心理刻畫方面也顯示出托爾斯泰小說的影響。《不如歸》對清末讀者的吸引力，主要在於其感人的情境氛圍，以及對親子、婆媳問題之揭露，但林紓卻迴避這個詮釋角度，轉而注意此書對甲午海戰的寫實敘述及其標誌國恥的教育意義，他藉著大量的譯註批評清軍的戰略缺失，並為閩人水師雪冤。此外，林譯《不如歸》特殊的情感想像方式更影響了民初「言情／愛國小說」的出現，並催生了一種「以殉國為殉情」的新式英雄人物。《不如歸》的作者、譯者、讀者三方之間的複雜權力關係與互相規避拒斥，使得它成為清末翻譯文學史上的重要案例。

關鍵詞：德富蘆花、《不如歸》、林紓、甲午戰爭、言情／愛國小說

收件：2011年9月2日；修改：2012年1月2日；接受：2012年1月19日

Discourse on Affection and National Crisis in Lin Shu's Translation of *Nami-ko*

Shaw-Yu Pan

Nami-ko (1898-1899) by the Japanese writer Tokutomi Roka (1868-1927) was extremely popular during Meiji Japan and was translated into numerous languages. The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sentimental melodrama was rendered in 1908 by Lin Shu (1852-1924) and his interpreter Wei Yi (1880-1932), and this Chinese version was an immediate success in the literary market. The major theme of *Nami-ko*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conjugal affection and the feudal family. Although Tokutomi condemns the feudal family which destroys the romantic lov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he takes the *motherland* to be the refuge of heartbroken lovers. This peculiar way of combining sentimental and patriotic elements created a new type of romantic hero and influenced many future "sentimental/patriotic" novels in modern China. The foremost attraction of *Nami-ko* to late Qing readers was its depiction of conjugal love and problems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however, Lin purposely ignored this side of the story, for the reason that he chose to translate this novel based on his patriotic feelings. In *Nami-ko*, Tokutomi describes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4) in detail, thus providing Lin with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comment on the fiasco of the Qing navy and clear his Fujian soldiers' reputation. Interestingly, Lin argued that this melodrama, though written by a Japanese writer, could help prove the Chinese soldiers' bravery.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his translator status, Lin promoted his ideas of military tactics and criticized the problems of the Qing government in his commentary in the translation.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author intention, translator strategy, and reader response have made Lin Shu's translation of *Nami-ko* an intriguing and illuminating case for the study of late Q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history.

Keywords: Tokutomi Roka, *Nami-ko*, Lin Shu, Sino-Japanese War, sentimental/patriotic novel

Received: September 2, 2011; Revised: January 2, 2012; Accepted: January 19, 2012

前言、一部歷久彌新的暢銷小說

《不如歸》是日本作家德富蘆花（本名德富健次郎，1868-1927）¹的成名之作，也是明治時期最暢銷的小說，於1898年至1899年在日本《國民新聞》連載，1900年由民友社出版單行本，到了1909年已發行一百版，而在其後的二十餘年間，又再發行了一百版²，它在日本造成的閱讀熱潮是相當驚人的。1903年，《不如歸》被改編為戲劇在日本全國上演，廣受好評，成為「新派腳本」的代表作。《不如歸》是明治文學中最早被英譯的作品，也是第一部引起全球注意的日本小說：在1904年到1922年之間，它相繼被譯為英、德、法、俄、芬蘭、捷克、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等多國語言（鄒振環，1996，頁225-226；Zwicker, 2006, pp. 191-193）。在中文譯本方面，由近代重要翻譯家林紓（1852-1924）和魏易（1880-1932）合作，以鹽谷榮（1873-?）與E. F. Edgett（1867-1946）合譯的英譯本 *Nami-Ko*（1904）為底本，並部分參照日文原書而將其重譯為中文³，1908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在1914年被編入「林譯小說叢書」，其後又被編入「說部叢書」，自1908年到1927年前後再版了六次（鄒波，2009，頁124），可見其受歡迎之程度。由於這個版本的翻譯，是由魏易口授、林紓筆述的方式進行，因此甚至可以說是一部被三度翻譯的作品，由日文而英文，轉而為中文的口語，再轉為文言文⁴，其間經過了多重的語言和文化符碼轉換程序，這是林譯本跟後起的其他《不如歸》中譯版本之間最大的差別。

根據筆者的考察，在林譯之後，迄今至少還有九種《不如歸》的中文譯本出版，這些譯本多半從日文原著直接翻譯而成。其中包括1911年的杉原幸譯本（東京千代田書房出版）⁵、1926年的殷雄譯本（上海大通圖書社出版）、1933年的林雪清譯本（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1938年的錢稻孫譯本（僅譯出第一章，載《朔風》創刊號）、1959年的徐雲濤譯

本（台南經緯出版社出版）、1959年的豐子愷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75年的黃文良譯本（台南綜合出版社出版）、1986年的于雷譯本（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以及2004年的陳文山編譯本（高雄陳文山印行）等等，足見這部小說持續受到文學界的關注。在戲劇改編方面，馬絳士（生卒年不詳）將日人柳川春葉（1877-1918）所改編的新派《不如歸》腳本翻譯改寫為新劇劇本⁶，首先於1913年由新劇同志會在長沙演出（馬絳士，1989，頁345-416；夏敏，2006，頁121-122），其後則有春柳劇場（其成員以新劇同志會成員為基礎）及其他文明戲團體在上海多次演出⁷。《不如歸》號稱「春柳第一名作」（《申報》，1915年1月25日廣告），也是早期中國話劇上座率最高，最有影響的一部外國劇作（夏敏，2006，頁121-123；鄒振環，1996，頁225-226；黃愛華，2005，頁150-151）。一個多世紀以來，《不如歸》的諸多新譯本和戲劇改編，正證明了它對閱聽大眾的吸引力。

為何《不如歸》能廣受中日讀者歡迎，歷久不衰？主要原因或許是它的人物和情節能喚起大眾的共鳴，尤其是在儒家傳統影響下的東亞社會，個人情感受到家庭的壓抑，而這部氣氛幽婉哀傷的小說正好成為一種發洩的管道。《不如歸》乃是根據真人實事改編（劉崇稜，1982，頁37），故事敘述日本海軍軍官川島武男及其妻片岡浪子新婚燕爾，武男的寡母對此頗為嫉妒，因而百般折辱浪子，又聽從小人挑撥，趁武男出海之時，休了身染肺病的浪子，意欲另娶健康女子入門，以免使川島家香火中斷。武男返家後，得知此事，悲憤欲絕，便主動請纓，投入中日甲午戰爭。武男在海戰中負傷，返家休養，他雖與浪子心心相繫，然而卻礙於禮法，不能再續前緣。浪子臥病多時，本已逐漸康復，但在一次旅行的機會中，碰巧瞥見乘坐對面另外一列火車的武男，眼見平行的火車將兩人載往相反的遠方，浪子大慟，健康狀況急轉直下，終於抑鬱而死。德富蘆花寫作《不如歸》的背景是明治維新時期追求現代化的日本，主角武男既身為戰爭英雄，又對妻子深情款款，儼然是新式的武士典範，

因此贏得日本讀者的喜愛 (Introduction, 1905, pp. v-vi)；而在另一方面，浪子在專制家庭壓迫下所發出的絕望呼喊，也打動了許多讀者（尤其是女性）的心靈⁸。換句話說，《不如歸》以社會劇烈變動的時代為背景，寫出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家庭和個人之間的價值衝突，表現了一種徘徊困頓的痛苦之情，而這樣的情緒對於清末民初的中國讀者來說，可謂心有戚戚。

將德富蘆花的原著和鹽谷榮的英譯本、林紓的中譯本比較，中英兩種譯本都相當忠實地保留了原著的情節架構和人物形象，而不是近代常見的「豪傑譯」⁹。在文體方面，原著混合了日本的雅文體、「言文一致」體、以及歐化的語法結構，相當具有彈性（中村忠行，1949，頁24），書中對自然景色的描繪如詩如畫，獲得批評家一致的讚賞（德富健次郎，1929，頁295；Kominz, L. & Tokutomi R., 1986, p. 57）。鹽谷榮英譯本的文字較為簡單明確，且為了適應英語世界的讀者而淡化處理日本和歐美之間的文化差異¹⁰，但整體而言，英譯本仍致力於忠實傳達原著的精神。至於林紓的中譯本則採用了簡潔優美的文言，並刻意修飾書中的抒情場面，所以其氣氛的營造和感人的效果遠超過英譯本（潘少瑜，2008，頁90-91），而譯文中的寫景文字則有如山水小品，清麗可誦，某些段落甚至直逼古典詩詞的境界¹¹。

壹、永恆的家庭悲劇：《不如歸》與〈孔雀東南飛〉

儘管《不如歸》的時空背景設定在明治時期的日本，但熟悉中國古典文學的讀者，卻不難感覺到這部小說的文化根源所在。《不如歸》的情節有如現代版的〈孔雀東南飛〉，書中除了運用一些現代物質文明的產物如照片、電報、火車、軍艦等等作為點綴之外，其基本架構仍是敘述婆媳衝突所導致的家庭悲劇，因而十分容易為中國讀者所接受，而不會有隔閡之感。歐陽予倩（1889-1962）便曾一語道破《不如歸》的故事「跟

〈孔雀東南飛〉差不多一樣」（歐陽予倩，1990，頁169）。1909年楊少雲（生卒年不詳）於日本觀賞新派劇《不如歸》之後，作長詩〈不如歸行〉歌詠此事，詩中有云：「青山早瘞釵頭鳳」（楊少雲，1909，無頁碼），郁曼陀（生卒年不詳）又為其題辭云：「文章千古徐陵序，日出東南孔雀飛」（同上，無頁碼），可見時人早已察覺到《不如歸》與中國傳統家庭悲劇故事的相似性。

當我們將《不如歸》和〈孔雀東南飛〉對照閱讀，的確會發現二者之間有不少共通點：它們都敘述一對相愛的新婚夫妻被惡婆婆拆散的故事，媳婦劉蘭芝所感嘆的「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的處境，跟獨守空閨的浪子頗為類似；而焦仲卿和武男對自己妻子的深情，以及跟霸道的母親之間的對立局勢亦屬雷同。在婆媳問題方面，〈孔雀東南飛〉詩中的婆婆看不慣媳婦的「舉動自專由」，所以警告兒子「遣之慎莫留」；而《不如歸》裡的寡母則是因為嫉妒兒子和媳婦之間的親密情感，所以百般挑剔媳婦的所作所為，讓她有苦難言。逐漸地，婆媳問題演變為母子矛盾，寡母威逼武男必須在她和浪子之間作一選擇，兩人發生激烈爭吵，她在盛怒中斥責武男：

汝止勿言，汝重若妻，乃逾於爾父爾母耶？汝可謂愚悖已極。乃聲聲言其妻，而並不言爾父爾母，汝直狗彘。乃專寵浪子，而不知爾母，爾今不為吾子矣！（林紓、魏易譯，卷上，1914，頁79）

這樣的戲劇性衝突，跟〈孔雀東南飛〉詩中「府吏長跪告，伏惟啟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槌床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一段相近，兩篇作品雖然一中一日，且中間相隔了千年的漫長歲月，可是它們所描繪的母子和婆媳關係，卻似乎沒有太大的差異。《不如歸》和〈孔雀東南飛〉都充滿了對「女兒身世之難」¹²的感嘆，女主角們在面對掌握家中威權的婆婆時，無法捍衛自己的幸福，而她們的丈夫對此也無能為力（「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只能消

極地期待日後還有將妻子迎接回門的機會。這兩篇作品的結尾均為悲劇，男女主角們皆選擇以自己的生命來抗議家庭的專制壓迫，無論是自殺、病死或奔赴戰場，都表現了一種堅定的求死意志。這樣看來，《不如歸》和〈孔雀東南飛〉的故事情節幾乎可說是基於同一悲劇主題的變奏。

《不如歸》書中武男和母親的衝突，乃是導因於孝道與愛情之間的矛盾，蓋前者是為人子女天經地義的責任，而後者則是出於個體自我的選擇。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價值體系裡，沈溺於夫妻情愛往往意味著有虧孝道，因為這等於是突出了個人的欲望意志，而忽視對父母應盡的義務，嚴重時甚至可能會危害家族的整體利益。論者普遍認為，《不如歸》控訴了不合理的封建家長制度，歌頌夫妻之間的「純愛」（楚永娟，2010，頁114；瀨戶宏，2004，頁55-56），然而必須辨明的是，《不如歸》對傳統家庭的不滿，僅只聚焦在惡婆婆一人身上，且男女主角並未採取激烈的行動以推翻封建家長，在無效的反抗之後，他們終究屈服於傳統權威之下（Ito, 2008, p. 76），除了棄絕自己的生命以外，無法以任何積極的作為扭轉現狀。武男只能在心中發下誓願，終生以浪子為妻，但在現實中卻無法違逆母親的成命，他所能做的最大膽的反叛，便是參與戰爭，藉祖國的更高權威來對抗母親的逼迫。因此，《不如歸》在社會上所發揮的是一種「勸世」的功能，而未必是控訴封建家長制度，甚或顛覆傳統的階級觀念。換言之，德富蘆花不過是希望在既有的親子尊卑架構之中，為夫妻的情感尋求多一點空間，《不如歸》書中的道德觀仍是相對保守的，或許也因此而能獲得清末大眾讀者的同情。

貳、世變與創傷：林譯《不如歸》的國難論述

清末流傳的「國恥癡情兩淒絕，傷心怕讀《不如歸》」的詩句，點出了林譯《不如歸》的「情恨」與「國恥」兩大主題（鄒振環，1996，頁227-228）。就這兩個主題來看，清末讀者多為此書「情恨」的抒發而動

容，而「國恥」則是次要；但是譯者林紓的態度卻與讀者恰恰相反，他未必不知道此書對讀者的吸引力何在，可是對他而言，書中對甲午海戰的描述，以及由此凸顯的軍事教育和改革的急迫性，才是比較值得關心的重點——雖然在翻譯的過程中，他也不免被書中的纏綿哀情所感動¹³。梁啟超在〈新小說社徵文啟〉中宣稱：「本社所最欲得者為寫情小說，惟必須寫兒女之情而寓愛國之意者，乃為有益時局」（梁啟超，1902）¹⁴，認為若在愛情故事中加上愛國精神的描寫，以此鼓勵國民發憤圖強，方能對國家社稷有所裨益。一向服膺梁啟超「小說界革命」論述的林紓（潘少瑜，2008，頁57）或許在德富蘆花的筆下找到了「寫兒女之情而寓愛國之意」的言情小說完美典範，因為《不如歸》既刻畫了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又呈現了日本軍人的愛國情操和尚武精神。有意思的是，德富蘆花在他的自傳性小說《富士》（1925）中提到，他之所以在《不如歸》裡插敘海戰的場面，是為了要增添陽剛的男人味，以免使它變成一個僅關乎兒女啼笑的單純家庭故事（德富健次郎，1929，頁203）。寫作之時，德富蘆花曾考慮是否要安排武男在浪子死後自殺；但如此一來，《不如歸》將淪為一部陳腐的愛情悲劇，所以武男雖然失去了愛妻，但是他不應該墮落消沈，更不能輕生。德富蘆花認為：「要讓男人回歸男人的角色，除了女人的愛以外，更需要男人本身的力量」（德富健次郎，1929，頁215）¹⁵，所以最後他讓武男和岳父片岡中將在浪子的墓前緊握彼此的雙手，相互勉勵，中將並邀請武男「至老夫家論臺灣事」（林紓、魏易譯，卷下，1914，頁69），繼續為帝國的偉業而奮鬥。換句話說，按照德富蘆花的構思，《不如歸》書中對戰爭和愛國情操的描寫只是插曲，為的是襯托武男的英雄形象，並非小說的主題，但是這些描寫卻正好符合林紓對理想言情小說的期待，而成為他特別重視的段落。例如在前述的故事尾聲，林紓便評論道：「雖屬情恨，結穴仍說國憂，足見日本人之愛國」（林紓、魏易譯，卷下，1914，頁69-70），強調了《不如歸》融合言情與愛國題材的文本特質。因此，林紓對於《不如歸》意旨的解讀方向不但偏離了作者的構

想，也故意跟一般讀者背道而馳，而執著於他自己所認定的此書的積極意義，這在翻譯史上可說是頗為奇特的現象。

姑且不論林紓是否刻意「誤讀」《不如歸》，戰爭場面在此書中確實佔有相當的分量，讀來也讓人熱血沸騰。德富蘆花在第十八章「鳴綠之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來鋪寫甲午海戰（又稱「大東溝海戰」或「黃海海戰」）的場面¹⁶，筆力萬鈞，林紓的譯文也貼切地呈現出戰雲密布的緊張氣氛（為求文意明晰，暫時省略此段譯文中的夾註）：

少須，敵旗皆見，當中為兩大鐵甲，曰鎮遠，曰定遠；又曰經遠，曰致遠，曰廣甲、濟遠為左翼；來遠、靖遠、超勇、揚威為右翼。又見四戰鬪艦：曰平遠、廣丙、鎮東、鎮西，又有魚雷艇六，隨後而來。日本水師仍作一線，向敵中軍而前，相距可一萬迷突。先鋒遊弋隊，左向攻敵之右翼，餘艦向左而前。日本陣勢初作T形，後乃為V形，相距可六千迷突。忽見鎮遠船頭白煙外冒，兩三十森的迷達巨彈直出向空氣中來，墜於水中，海水飛立如銀。黃海中昨夕受月如鏡，晨來受震亦紅鮮如畫，今則幻為戰場矣。……忽聞轟雷一聲，巨彈已近松島，仍落海中，海水直立至五丈以外。武男大驚，立又鎮定。左右皆失色。……忽見敵船出一彈直趣礮旁而炸，一礮兵捧彈且前，立仆武男之後，欲起復仆，血射武男之衣，……時日本中軍隊在右，先鋒在左，兩兩合攻，礮火無晷刻之停。戰事愈烈，武男愈致其死，平日所學之功課，幾幾忘之，今日則一一奔赴其腦，舍少停時不呼，其餘咸大叫發令，聲幾為喑。敵船之礮攻松島，鐵皮皆脫，木片為焦，滿船皆血。而武男神息如恆，覺敵船礮聲乃與己心血同沸。礮或少停，心轉弗怡。（林紓、魏易譯，卷下，1914，頁23-26）¹⁷

與晚清作家的《中東大戰演義》、《消息演義》等作品對甲午海戰的描寫相比（洪子貳，1958，頁150-151；程道一，1958，頁255-256），德富蘆花對人物心理的刻畫遠為細膩豐富，且以一名普通軍官而非主帥作為敘事焦點，以其所見所聞反映戰況之激烈，採用近距離的「運鏡」方

式，使讀者產生強烈的臨場感，並營造緊張和悲壯的氣氛，在藝術手法上確有過人之處。根據史家記載，松島艦是此次海戰中受創最重、死傷最慘的日艦，其官兵勇敢無畏的表現也極受景仰（松島艦の勇戰，1894，頁1），因此德富蘆花選擇將武男放在松島艦而非其他船艦上的做法，可謂別具深意。德富蘆花把戰爭場景與全書的情感主題密切地聯繫起來，深刻地描寫武男在海戰中複雜的心理狀態：對武男而言，這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也是他身為兒子跟霸道的母親之間的戰爭，松島艦上血流成河的悲慘場景，乃是武男個人悲劇的陪襯。

然而在林紓的眼裡，《不如歸》第十八章的重要性卻在於其史料價值：

甲午戰事，人人痛恨閩人水師之不武，望敵而逃。余戚友中殉節者，可數人。死狀甚烈，而顧不能勝毀者之口，欲著《甲午海軍戴盆》以辨其誣。今譯此書，出之日人之口，則知吾閩人非不能戰矣！（林紓、魏易譯，卷下，1914，頁27）

由此看來，林紓選擇翻譯這部小說的主要理由，是因為它能夠揭露甲午海戰的事實真相，為閩人水師辨誣，這可以說是林紓「主文譎諫」的翻譯策略。林紓在《不如歸》的譯序中說：「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為叫旦之雞，冀吾同胞警醒。恆於小說序中，據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林紓，1914，頁3），表明了他藉翻譯小說之序文發言警世的宗旨。跟標誌國族恥辱與創傷比較起來，《不如歸》作為「家庭之勸懲」的良好用意（同上，頁1），對林紓來說只是附加的價值——有趣的是，林紓對《不如歸》內容主題的取舍正好跟各國戲劇團體改編演出此書時的做法相反（夏敏，2006，頁122；金鍾珍，2010，頁42）。簡言之，林紓寧願相信《不如歸》是一部「紀實小說」¹⁸，甚至是「軍事小說」，而避開多數讀者對它的詮釋角度，亦即「言情小說」或「家庭小說」¹⁹。林紓認為日方關於甲午海戰的報導，由於觀戰者多，「防為所譏，措語不能不出於紀

實」(林紓, 1914, 頁 2), 應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既然如此, 那麼德富蘆花在書中所描寫的鎮遠號、定遠號「如是能戰, 則非決然遁逃可知矣!」(同上, 頁 2) 在林紓看來, 《不如歸》對甲午海戰的詳細敘述正好能夠替那些奮勇殺敵的中國水師將弁(多為林紓的福建同鄉)一雪冤屈: 林紓曾作〈徐景顏傳〉, 緬懷在海戰中殉國的閩籍將領林少谷和楊雨亭之忠烈(林紓, 1992, 頁 28), 但他認為光是靠自己的一面之詞, 不足以塞眾人悠悠之口, 而「敵國」作家所寫的「紀實小說」, 卻反而能夠佐證他所言不虛——「若云林紓譯時為鄉人鋪張, 則和文、西文俱在, 可考而知。天日在上, 何可欺也!」(林紓、魏易譯, 卷下, 1914, 頁 27-28) 林紓一生翻譯了一百六十餘種外國小說²⁰, 只有《不如歸》一書為日人之作, 估計他可能是為了國族情感的緣故, 而不願翻譯日本小說, 若非《不如歸》書中記載了戰爭「實況」, 他也未必會垂青此書。換句話說, 林紓翻譯《不如歸》帶有強烈的目的性, 這點使他執意忽視作者的創作意圖和一般讀者的欣賞角度, 而對《不如歸》的文本做出個人色彩極濃的詮釋。

在梁啟超「小說界革命」理念的影響之下, 林紓相當看重翻譯小說的啟蒙教育價值, 尤其是小說中對戰爭的描寫, 更受到他的關注, 因為他認為詳實的戰爭場面刻畫, 可以做為一種淺易的軍事教材, 對於增強中國軍隊的戰力, 不無裨益。林紓在 1904 年為翻譯小說《利俾瑟戰血餘腥記》(*The Conscript*) 所作的跋文中說道:

是書果能遍使吾華之人讀之, 則軍行實狀, 已洞然胸中, 進退作止, 均有程限, 快槍急彈之中, 應抵應避, 咸蓄成算, 或不至於觸敵即餒, 見危輒奔, 則是書用代兵書讀之, 亦奚不可者? (林紓, 1997, 頁 139)

既然如此, 那麼像《不如歸》這樣生動而詳細地描繪了甲午海戰場面的小說, 自然也具有相當的教育意義了。林紓在譯序中提綱挈領地指出:

果當時因大敗之後，收其敗餘之殘卒，加以養，俾為新卒之導，又廣設水師將弁學校，以教育英雋之士，水師即未成軍，而後來之秀，固人人可為水師將弁者也。須知不經敗衄，亦不知軍中所以致敗之道，知其所以致敗而更革之，仍可自立於不敗。（林紓，1914，頁2）

北洋海軍在甲午海戰中雖然慘敗，但若妥善傳承經驗、汲取教訓，此種「負面教材」仍可成為後事之師，引領中國邁向未來的成功，而不會只是一次不堪回首的國恥創傷。換句話說，對林紓而言，《不如歸》書中所記載的北洋海軍的諸多失誤，正是對大眾進行常識性軍事教育的最佳教材，也是對主政者的沉痛勸諫。因此，林紓在譯文中插入許多夾註，以「事後諸葛」的角度來批評北洋海軍的用人不當和戰略疏失。例如他在「先鋒遊弋隊，左向攻敵（按：此處之「敵」乃指清軍）之右翼，餘艦向左面前」一段之後註道：

時吾國之大將丁汝昌屬兵事於漢納根，將紅旗死懸於桅上。日本變其陣法，而吾軍乃不變，竟以船舷受礮，故立敗。漢納根不審兵事，蓋一工匠也。若郎威里在者，甯有此失！郎威里為劉步蟾所逐，而將弁又互相疑貳，安得不敗！（林紓、魏易譯，卷下，1914，頁23）

林紓責怪漢納根不懂得兵法應變的道理，而清廷用人不當，將士不能齊心協力，更是種下了敗戰的禍根。此外，林紓又在「兩三十森的迷達巨彈，直出向空氣中來，墜於水中，海水飛立如銀」數句之後夾註：「此即帥船，乃不測量而彈妄出矣！」（同上，頁23）對於書中所描寫的「時中軍艦為半壺形，圍敵之右翼於壺中」的情形，林紓則評論道：「此時吾國魚雷艇又安在？此足見丁汝昌之將令矣！」（同上，頁25）就連「武男及一大尉司左舷快礮」這樣一句簡單的敘述，也能勾起林紓對清廷的不滿：「時吾國艦隊竟從部臣之令，省費不購一快礮，李文忠不能爭也！」（同上，頁22）最後林紓更以史家的春秋之筆，對清軍的慘敗發表評論：

即以丁汝昌、劉步蟾言，雖非將才，尚不降敵而死，亦自可憫。唯軍機遙制，主將不知兵事，故至於此。吾深恨郎威里之去，已為海軍全毀之張本矣，哀哉！（同上，頁 27-28）

在稍後的小說段落中，林紓又頻頻要求國人記取失敗的教訓（括號中為林紓的夾註）：

明年正二兩月，日本兵得威海。（此又中國壯士之紀念日也。）北洋水師全軍歿。（中國壯士記之。）三月中得遼東。（中國壯士記之。）北方日師大勢絕盛，遼河以東無敵師矣。（同上，頁 55）

由此可見，林紓在翻譯文本中摻入了許多的個人情緒和主觀意見，並且亟欲將這些訊息傳達給讀者，希望能影響讀者的想法。在《不如歸》的譯序裡，林紓將自己的意見歸納為兩點：「所願當事諸公，先培育人材，更積資為購船製礮之用，未為晚也」（林紓，1914，頁 3），這是他藉著翻譯小說的機會，對清政府提出的誠懇建議。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日甲午海戰的勝敗攸關中國的命運，然而當時中國的各大報紙對此次戰役的報導，卻暴露了新聞寫作的虛構性和清廷諱敗為勝的心理²¹：戰事頭緒紛雜，消息來源又不盡可信，使得記者必須每日追述補充資訊，不斷修正先前的新聞報導。隨著時間的流逝，記者從原本的誤以為北洋海軍戰勝，到後來得知實情，開始對將領的疏失加以反省檢討²²，海戰報導的篇幅逐漸拉長，細節日益豐富明晰，對戰爭勝敗的評判也逐漸塵埃落定。可是對關心國事的林紓來說，這樣虛虛實實的新聞報導未必能滿足他，他渴求的是更貼近事實真相的資訊，而弔詭的是，在戰爭實況的記敘方面，一部日本的小說卻似乎比中國報紙的新聞報導更具有準確性和公信力。林紓指出：

或乃又謂渤海之戰，師船望敵而遁，是又讐言。吾戚林少谷都督戰死海上，人人見之。同時殉難者，不可指數。文襄、文肅所教育之人才，至

是幾一空焉。余向欲著《甲午海軍覆盆錄》，未及竟其事。然海上之惡戰，吾歷歷知之，顧欲言，而人亦莫信焉。今得是書，則出日本名士之手筆。其言鎮定二艦，當敵如鐵山；松島旗船，死者如積。大戰竟日，而吾二艦卒獲全，不燬於敵，此尚言其臨敵而逃乎？吾國史家好放言。既勝敵矣，則必極言敵之醜敝畏葸；而吾軍之殺敵致果，凜若天人，用以為快。所云下馬草露布者，吾又安知其露布中作何語耶！若文明之國則不然，以觀戰者多。防為所譏，措語不能不出於紀實。既紀實矣，則日本名士所云中國之二艦，如是能戰，則非決然遁逃可知矣！（林紓、魏易譯，卷上，1914，頁2）

林紓認為，原作者德富蘆花既是一位名士，而日本作為一個文明國家又不可能隱瞞或竄改戰爭真相，因此書中所寫北洋艦隊作戰時的大無畏氣魄，應為實錄。然而，林紓的論點是有明顯漏洞的：首先，《不如歸》雖號稱「紀實小說」，然而它畢竟不是史書，而是小說，書中關於戰爭場面的描述難免含有虛構想像的成分，不可能完全符合歷史事實；其次，故事情節描寫男主角武男因婚姻家庭受挫，憤而請纓殺敵，作者為了襯托他慷慨激昂的氣概，當然要盡量把他的對手（也就是北洋海軍）形容得英明神武，若是對手不堪一擊，武男意欲殉國的悲壯之情就難免顯得滑稽可笑了。由創作的角度來看，德富蘆花寫小說時的用心和史家有著相當大的差別，而文學的表現手法和「史筆」也不應混為一談，這恐怕是林紓未曾考慮到的——當然他也有可能故意忽略這一點。林紓在譯序中已經承認閱讀小說時「明知其為駕虛之談，顧其情況逼肖，既閱猶若斤斤於心」（林紓，1914，頁1），對照此處他對《不如歸》「史筆」之忠實可信的肯定態度，顯得頗為矛盾。

綜上所論，我們可以看到林紓企圖賦予《不如歸》的教育意義，乃在於以甲午海戰失敗的經驗作為前車之鑑，敦促清廷主事者重視人材培育、妥善運用軍事經費，並為北洋海軍洗刷冤屈。林紓利用身為譯者之便，在譯文中使用大量的評論和夾註來發表他個人的想法，使得翻譯小

說成為他發聲的場域，這可說是他「主文譎諫」的翻譯策略。林紓刻意對小說的虛構性質和作者原本的藝術構思視而不見，又企圖強力主導讀者對文本的詮釋和觀感，經過他「特殊處理」的《不如歸》，遂成為一個包含著相當複雜的「作者—譯者—讀者」權力關係的翻譯文本。在《不如歸》原有的敘事架構之中，歌頌的是祖國日本的榮耀，而戰敗的「敵國」指的則是譯者林紓的祖國中國，「我勝敵敗」的情勢是相當明顯的；但愛國心切的林紓卻硬是將洋溢著帝國光榮的小說段落轉換為「中國壯士」不可不知的國恥現場。對林紓而言，《不如歸》儘管是日本作家的小說，卻能被當作北洋海軍英勇作戰的鐵證，這可以說是相當特殊的文本閱讀和運用方式，也赤裸裸地呈現出作者和譯者之間的權力拉鋸戰。無奈的是，就後來的戲劇改編版本和觀眾反應來看，林紓的詮釋角度似乎曲高和寡，因為一般大眾所關心的還是探討家庭婆媳問題的《不如歸》，而非喚醒國仇家恨的《不如歸》。

參、家國之愛：

《不如歸》之原著與林譯的情感想像

除了對專制家庭的控訴，以及對戰爭場面的描寫之外，《不如歸》還有一個值得注意之處，亦即其情感想像的方式。在故事中，當武男發現他的甜蜜婚姻已被惡毒的母親破壞，於是決定親赴戰場，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國家，藉此忘懷傷痛，這種心態與俄國文豪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的《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1877）書中的男主角伏倫斯基（Vronsky）十分相似。伏倫斯基在情人自盡之後，情緒極度低潮，適逢塞爾維亞戰爭爆發，他便決心加入志願軍，奉獻自己的生命，因為這是唯一能使他振作起來的事：

「我這人，」伏倫斯基說，「好就好在對生死毫不在意。衝鋒也好，斃

也好，倒下也好，我的力氣都是足夠的——這一點我知道。我高興的是有機會獻出我的生命——我覺得不僅多餘而且簡直討厭的生命。它對別人也許還有點用處。」（草嬰譯，2002，頁 985）

伏倫斯基的這段自白，幾乎可以說是武男的心聲——生命對他們而言，已經成為「多餘而且簡直討厭」之物，如今他們只希望能夠「廢物利用」，在沙場上以身殉國。《不如歸》和《安娜·卡列尼娜》書中近似的人物心理描寫或許看似巧合，但其實大有玄機：德富蘆花從年輕時代便非常欣賞托爾斯泰的作品，他不但撰寫了第一部完整的日文托爾斯泰傳記，翻譯過數篇托爾斯泰的論文，又曾親至俄羅斯拜訪托翁，返國後仿效其獨特的田園生活方式度日，贏得「小托爾斯泰」的外號（Kominz & Tokutomi, 1986, p. 70; Zwicker, 2006, pp. 170 & 176）。德富蘆花曾寄贈《不如歸》的英譯本給托爾斯泰，托翁讀過之後，認為此書是對西方文學（尤其是他的作品）的模仿之作（Kominz & Tokutomi, 1986, p. 52）；再加上德富蘆花對《安娜·卡列尼娜》十分熟稔和喜愛²³，種種跡象顯示，《不如歸》描述武男因情感受挫而參戰的情節，很有可能襲自《安娜·卡列尼娜》。

由於《安娜·卡列尼娜》在中國翻譯出版的時間較晚²⁴，所以民初言情小說中的類似情節（詳後），應該不是直接受到托爾斯泰作品的啟發，而是間接由《不如歸》學習得來，而且林紓的譯筆在其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例如以下的段落：

（武男）告母曰：「母殺浪子即殺我，我行，不歸矣。」立時登車，赴橫須賀兵輪而去。……武男但備此身為受礮之鵠，行時一無顧戀，但圖一死。……後此軍中事，驚奇百出，乃無餘暇思及家中。然身雖勞碌，亦不言勞，謂正借此以消相思之日月。且國家多難，但圖以身殉國，掩蓋其無窮之長恨！此時視死直等灰塵。（林紓、魏易譯，卷下，1914，頁 17、20）

試將此段譯文對照林紓所依據的鹽谷榮英譯本²⁵，便能看出林紓對武男的心路歷程重新作了詮釋：他將“Preferring to be a target for a shell rather than to preserve his useless life”一句譯為「武男但備此身為受礮之鵠，行時一無顧戀，但圖一死」，語氣更加強烈，強調了武男無所顧忌的求死之心，並且刪去了英譯中武男自認其生命沒有價值的字句（his useless life），使他的形象更顯堅強。其次，林紓把“to avoid dwelling upon the one thing that consumed his soul”意譯為「借此以消相思之日月」，亦即將英譯本較為委婉的說法（the one thing that consumed his soul）直接點明為相思之情，又自行添加了「但圖以身殉國」一句，這樣的做法把武男的私人情愛和殉國之志緊密聯繫起來，強調了他「以殉國為殉情」的心態，然而這種心態在德富蘆花的原作中只是隱約暗示，並未直接寫出²⁶。我們可以說，林紓的翻譯坐實了原著隱晦的情感想像，重新詮釋了武男參戰的動機。比起〈孔雀東南飛〉詩中的焦仲卿只能「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林譯《不如歸》裡的武男請纓出戰的決定不僅凸顯了他剛毅的性格，更是以國族的神聖使命來代替個人小我的情感關懷，使得殉國成為一種昇華的「殉情」，從而賦予死亡更高的精神價值。

在林紓優美譯筆的催化下，《不如歸》書中「以殉國為殉情」的情節引起了中國作家的高度興趣，從此以後，言情小說中的男主角在失戀之餘，除了出家、自殺、或是「披髮入山，不知所終」等選項之外，又多了「投筆從戎」這種更有意義的出路。例如鴛鴦蝴蝶派開山祖師徐枕亞（1889-1937）的暢銷小說《玉梨魂》（1912），男主角何夢霞由於婚戀受挫，萬念俱灰，決定投身辛亥革命，故事中的敘事者評論道：

夫殉情而死與殉國而死，其輕重之相去為何如！曩令夢霞竟死殉梨娘，作韓憑第二，不過為茫茫情海添一個鬼魂，莽莽乾坤留一椿恨事而已。此固非夢霞之所以報梨娘，而亦非梨娘之所望於夢霞者也。天下惟至情人，乃能一時忽然若忘情。夢霞不死於埋香之日，非惜死也。不死，

正所以慰梨娘也。卒死於革命之役，死於戰，仍死於情也。（徐枕亞，1997，頁 372）

文中指出，如果何夢霞僅僅為了梨娘殉情而死，則只不過是替天地間增添一樁恨事罷了，倒不如將一己的生命奉獻給國家，雖然表面上死於敵人的砲火，但實際上仍是為情愛而死，且死得更有價值。這種論點或許是受了《不如歸》的影響，而且情節上也有模仿的痕跡，何夢霞的死法，正像是武男極為渴望卻得不到的；而「天下惟至情人，乃能一時忽然若忘情」的考語，亦未嘗不可用於武男身上。

林譯《不如歸》和後繼的《玉梨魂》將家國意識變成了言情小說中重要的情節推動力，並在原本屬於私人的愛情關係上添加了巨大的重量。所謂「死有輕如鴻毛，有重於泰山」，從愛人到愛國，由消極的殉情轉向積極的殉國，不僅是為個人的生命找尋意義，同時也是為那在現實中飽受禮教威權壓制的愛情尋求抗衡的力量，國族大義在此成為意欲尋死的失戀者的最佳藉口。《不如歸》和《玉梨魂》都呈現了戀愛與國族情感二者之間極其類似的精神性特質；換句話說，這兩部小說的男主角都深深愛著那無法觸及的戀人（亦即他們的妻子／情人／國家），甚至願意為其奉獻生命。此種愛情與愛國糾纏的狂熱情感，影響其後的小說創作，化而為新式的「言情／愛國小說」，傳統言情小說中的「情癡」逐漸演化為愛國的多情英雄，武男與何夢霞遂成為「兒女英雄」的新典範。一位民初時期的讀者曾經發表對《不如歸》的感想：

曩嘗讀《不如歸》說部，知愛情與尚武精神有異途同歸之關係，更觀歐戰中報載世界要聞，益足徵信其立意構局要非子虛，《不如歸》一書之不脛而走，良有以也。蓋彼於愛情，輒不惜殉之以身，而血飛肉舞之戰場，尤視若上界清都，故於風馬牛不相及中，竟有此英雄兒女之壯史，而與我國所謂情長氣短者，正作一反比例也。（秩音，1919）

對這位讀者而言，《不如歸》的浪漫之處，正在於作者將愛情和戰爭

這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主題融合為一，跳脫了傳統言情小說「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的窠臼。《不如歸》既然啟示了「愛情與尚武精神有異途同歸之關係」，將個人對情人和對國家的感情聯繫起來，「寫兒女之情而寓愛國之意」，甚至以純潔的愛情來鼓舞愛國志氣，而這樣的言情小說，未必不能被當作愛國小說來閱讀和詮釋。

肆、結論

故事情節與〈孔雀東南飛〉近似的林譯小說《不如歸》，不僅抨擊家庭專制之惡，讓清末讀者得以抒發心頭之積鬱，也為中國近現代言情小說的創作啟示了一條新的道路。日本作家德富蘆花受到托爾斯泰作品的啟發，創造了川島武男這樣一位因為婚戀失敗而意欲在戰場上拋擲生命的男主角，而林紓在重譯的過程中進一步將其情感想像詮釋為「以殉國為殉情」，不但連結了小我的愛情和大我的國族情感，開發了以言情小說融會愛國宗旨的寫作徑路，更塑造出新的「兒女英雄」人物典型，影響到後來的「言情／愛國小說」的產生。林紓企圖把《不如歸》當作軍事教育書籍來教育民眾，並以譯註和評論的方式，抒發他個人對於清廷的不滿，試圖澄清輿論對閩人水師的誤解，然而這部翻譯小說對於多數讀者的感染力和影響力，卻主要來自於被林紓刻意輕忽的夫妻情愛和婆媳問題的部分。因此，在這部內涵豐富的翻譯文本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清末時期的國難創傷論述以及特殊的情感想像，其作者、譯者、讀者三方之間的複雜權力關係和彼此的規避拒斥，更使得《不如歸》成為清末翻譯文學史上的重要案例。

註釋

1. 關於德富蘆花的生平事蹟，可參考 Kenneth Strong (1970, pp. 9-46)。
2. 關於《不如歸》在日本報刊連載與出版的情形，可參考 Jonathan E. Zwicker (2006, pp.

- 191-192)。
3. 過去學界多半認為林紓的中譯本是直接依據鹽谷榮之英譯本翻譯而成，但近來有論者指出，若將林譯本、鹽谷榮譯本與原書對照，林譯所用的部分典故及專有名詞顯然是採自日文原書，因為這些細節在英譯本中已被省略或改寫；由此可推知，林紓與魏易翻譯時曾參核原著，而非僅僅依照英譯本。參考鄒波（2009，頁 126-128）。然而根據筆者的研究，林紓等人在翻譯時應未逐字逐句地對照日、英版本，因為林譯《不如歸》仍舊遺漏了原書的某些重要細節，而這些正好都是英譯本未予譯出的部分，例如女主角浪子死前的呼喊「決不再出生為女人」（這是原著裡最為人所知的一句話），便沒有出現在林譯之中。至於英譯者把這句名言刪除的可能原因，可參考 Kenneth Strong (1970, p. 29, n. 35)。
 4. 在對譯過程中，魏易究竟以何種方言或官話口授，目前未見文獻提及。魏易為杭州人，林紓為福州人，他們的鄉音不同，彼此之間或許是以官話溝通，但這只是筆者的揣測。
 5. 此中文譯本乃德富蘆花親自授意日人杉原幸（杉原夷山）所譯，為文言體，且附有評點（亦杉原幸所為）。參考杉原幸譯（1911，頁 271）。
 6. 關於馬絳士譯本與柳川春葉腳本的比較，可參考瀨戶宏（2004，頁 50-51）；陳凌虹（2008，頁 47-48）。關於馬絳士改編的《不如歸》劇本之內容特色，可參考袁國興（1993，頁 130-132）。
 7. 例如《申報》於 1914 年 5 月 1 日、5 月 28 日、7 月 11 日、7 月 12 日、9 月 6 日，以及 1915 年 1 月 25 日、2 月 18 日、3 月 30 日、5 月 14 日……等日期，均刊出春柳劇場搬演《不如歸》之廣告，可見此劇相當受觀眾歡迎，方能一再重演。
 8. 關於日本學者對《不如歸》原著的評論，可參考神立春樹（1991，頁 36-39）。
 9. 「豪傑譯」的定義可參考王曉平（1987，頁 161）：「明治初年的翻譯者，還常改變原作的主题、結構、人物。嚴格說來，只能稱作改寫或縮寫。這種翻譯的方式，被稱作『豪傑譯』，或許有譯者自命豪傑，揮動大筆，對原作宰割揮斥之意。這種『豪傑譯』在晚清也頗多見。」
 10. 相關例證可參考安藤義郎（1976，頁 6、9）。
 11. 例如林譯中有這樣的段落：「武男望園中，草雖常雜，而窗閉簾垂，黃熟之梅子，時時墜枝，玫瑰殘紅，狼籍滿地，咸帶溼香。人聲都渺，但聞蟬聲噪於樹間。」譯筆相當細緻優美。見林紓、魏易（譯）（1914，卷下，頁 57）。按：本文所引用之林譯《不如歸》乃是根據商務印書館 1914 年「林譯小說叢書」之版本，但因此一版本無新式標點，故在斷句標點方面以 1981 年商務印書館所出版之簡體版《不如歸》為準。
 12. 林紓、魏易（譯）（1914，卷上，頁 55）：「（浪子）自念夫婦敦睦為人生倖福，而因是開罪於姑，則女兒身世之難可想矣。」
 13. 例如書中敘述浪子死前仍然心繫武男給她的訂婚戒指，林紓在此段譯文中夾註道：「余譯至此，幾於不能下筆。」見林紓、魏易（譯）（1914，卷下，頁 63）。
 14. 原文雖未標明作者之名，但學者咸認此徵文啟事應出自梁啟超之手。參考夏曉虹（2002，頁 639）。

15. 此段中文翻譯採用陳凌虹（2008，頁 53，註 17）。
16. 關於歷史上甲午海戰的詳細經過及史料真偽的辯證，可參考戚其章（2006，頁 163-294）。德富蘆花寫作《不如歸》時曾對甲午海戰史實進行了一番調查，他親自到橫須賀觀察軍艦，又參考了當年曾搭乘高千穗艦的金波樓主人（小笠原長生，1867-1958）所著之《海戰日錄》，耗費許多精力才完成此章。大致說來，《不如歸》對海戰過程的描述相當貼近史實，但是在人物言行和心理描寫方面，則是出於德富蘆花自己的創造。參考德富健次郎（1929，頁 203）；小笠原長生（1939，頁 549-564）。
17. 林紓譯文中所提及北洋水師的船艦名稱，與鹽谷榮英譯本有所出入，但卻與德富蘆花原著相符，此亦為林譯參照日文原著之證。但原著中之「鎮南」艦，林譯卻改為「鎮西」艦，未知何據。參考 Tokutomi (1905, p. 212)；德富蘆花（2007，頁 150）。
18. 《不如歸》的鹽谷榮英譯本之副標題為“A Realistic Novel”，即「紀實小說」之意。
19. 日本讀者多半將《不如歸》視為「家庭小說」，參考神立春樹（1991，頁 36-38）。
20. 根據馬泰來的統計，林譯作品今日可知者凡一八四種，單行本一三七種，其中有一百六十餘種為小說。完整書目請參見馬泰來（1981，頁 60-103）。
21. 日本人對清人佯勝諱敗的心理以及對此次戰爭報導之不實多所嘲諷，如〈海戰に關する清國の風評〉（1894，頁 32）；又如〈海戰詳述〉（1897，頁 42-43）。
22. 例如 1894 年 9 月 20 日《申報》有〈水師得勝〉、〈勝倭餘話〉等篇報導清軍獲勝的消息，21 日〈詭計盡露〉一文指責日本方面對日軍戰勝之新聞報導不實，22 日有〈勝倭續電〉，23 日之〈詳述鴨綠江勝倭確信〉更說：「此電係西人所發，與倭奴之諱敗為勝者迥乎不同，觀此情形，倭人實已異常狼狽，同日又有〈烟臺訪事人述海軍得勝事〉一文。27 日〈倭奴諱敗〉、〈貽笑鄰邦〉條仍堅稱日本「諱敗為勝」。時至 29 日，〈烟臺訪事人述鴨綠江戰事〉一文才開始承認清軍在甲午海戰中所犯的錯誤，其後則有 9 月 30 日〈鴨綠江戰事餘聞〉和〈管駕正法〉、10 月 1 日〈死有餘辜〉、10 月 2 日〈紀海戰詳細情形〉等，抨擊臨陣脫逃的海軍將領，10 月 9 日則有長篇社論〈讀本報紀鴨綠江之戰而系之以論〉，全面檢討此次戰役致敗之因，並提出戰術上的改進建議。其後尚有 10 月 14 日的〈倭船受創〉、10 月 19 日的〈紀濟遠兵船兩次開仗情形〉等補充報導。
23. 德富蘆花在他 1897 年所寫的托爾斯泰傳記中，對《安娜·卡列尼娜》與《戰爭與和平》等書做了情節摘要和評論，而在他的《順禮紀行》（1906）裡，則記敘了他跟托爾斯泰一家人的相處過程，並經常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物和場景跟自己在托翁家鄉的所見所感相對照，足見他對此書的熟悉與喜愛程度。參考 Kominz & Tokutomi (1986, p. 51 n. 3 & pp. 80, 83, 84, 86-87, 91)。
24. 此書最初譯為《婀娜小史》，由陳家麟、陳大鎰合譯，1917 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25. 見 Tokutomi (1905, pp. 196, 206-207): “‘Mother, you have killed Nami and me, too. I will never see you again.’ Takeo went back at once to his war-vessel at Yokosuka... Preferring to be a target for a shell rather than to preserve his useless life, Takeo immediately left on duty for the West... Things wonderful to his mind and eyes followed one after another, and did not allow him time even to stop to think. So much the better for him; for he was thereby able to avoid dwelling upon the one thing that consumed his soul. In his country’s hour of

trial, his private affairs, though they were a question of life or death to him, were lost sight of. Thus he thought, and, burying his grief, followed his duty, and with all his desperate courage engaged in battle. To him, indeed, death was of no more value than a particle of dust.”

26. 原文見德富蘆花（2007，頁146）：「多謝す、これがために武男はその心をのみ尽くさんとするあるものをば思わずして、わずかにわれを持したるなりき。この国家の大事に際しては、渺たる滄海の一粟、自家川島武男が一身の死活浮沈、なんぞ問うに足らんや。彼はかく自ら叱し、かの痛をおおうてこの職分の道に従い、絶望の勇をあげて征戦の事に従えるなり。死を彼は真に塵よりも軽く思えり。」

感謝詞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10年6月由臺灣大學中文系與東華大學中文系合辦的第四屆「人文典範的探尋」學術研討會，得到楊芳燕教授和鄭毓瑜教授的評論與指導，謹此致謝。同時也要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高見，以及台大歷史所博士班恩塚貴子小姐在閱讀日文資料方面所提供的協助。

參考文獻

- 小笠原長生（1939）。海戰日錄，載於**戰爭文學全集**（頁515-631）。東京：潮文閣。
- 中村忠行（1949）。德富蘆花と現代中國文學（一）。**天理大學學報**，1(2-3)，頁1-28。
- 王曉平（1987）。**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
- 申報**（1982-1987），上海：上海書店，影印版。
- 安藤義郎（1976）。初めて歐米に紹介された日本の小説—「不如歸」とその英訳について—。**經濟集志**（人文・自然科學編），46，頁1-12。
- 杉原幸（譯）（1911）。德富蘆花著。**漢譯不如歸**。東京：千代田書房。
- 林紓（1914）。《不如歸》序。載於德富健次郎著，鹽谷榮英譯，林紓、魏易重譯，**不如歸**（上卷）（頁1-3）。上海：商務印書館。
- 林紓（1992）。徐景顏傳。載於林紓，**畏廬文集**（頁28-29）。民國叢書第四編，綜合類94冊，上海：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影印。
- 林紓（1997）。《利俾瑟戰血餘腥記》跋。載於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頁138-13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林紓、魏易（譯）（1914）。德富健次郎著。**不如歸**（上下卷）。上海：商務印書館。
- 林紓、魏易（譯）（1981）。德富健次郎著。**不如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金鍾珍（2010）。中韓戲劇接受日本《不如歸》的比較研究。**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頁40-44、102。
- 神立春樹（1991）。德富蘆花「不如歸」における時代描写。**岡山大学経済学会雑誌**，23（1），頁27-53。
- 松島艦の勇戦（1894）。載於河村直（編），**日清戰爭實記**（第七編）（頁1-6）。東京：博文館。
- 洪子貳（1958）。中東大戰演義。載於阿英（編），**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頁135-218）。北京：中華書局。
- 草嬰（譯）（2002）。列夫·托爾斯泰著。**安娜·卡列尼娜**（上下冊）。臺北：木馬文化。
- 夏敏（2006）。《不如歸》在中國的譯介。**語文學刊**（高教版），1，頁121-123。
- 夏曉虹（2002）。吳趸人與梁啟超關係鉤沈。**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0（6），頁636-640。
- 秩音（1919）。愛情與戰死，**先施樂園日報**，4月17日。
- 徐枕亞（1997）。《玉梨魂》。載於**中國近代珍稀本小說**（第十冊）（頁147-383）。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
- 袁國興（1993）。**中國話劇的孕育與生成**。臺北：文津出版社。
- 馬泰來（1981）。林紓翻譯作品全目。載於錢鍾書等著，**林紓的翻譯**（頁60-103）。北京：商務印書館。
- 馬絳士譯編（1989）。不如歸。載於陳革彥（編），**中國早期話劇選**（頁345-416）。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 海戦に關する清國の風評（1894）。載於河村直（編），**日清戰爭實記**（第六編）（頁32-34）。東京：博文館。
- 海戦詳述（1897）。載於川崎三郎，**日清戰史**（卷三）（頁42-44）。東京：博文館。
- 陳家麟、陳大鐙（譯）（1917）。托爾斯泰著。**安娜小史**。上海：中華書局。
- 陳凌虹（2008）。論《不如歸》與《家庭恩怨記》的情節劇特徵。**戲劇藝術**，4，頁41-55。
- 梁啟超（1902）。新小說社徵文啟。**新民叢報**，19。
- 戚其章（2006）。**走近甲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程道一（1958）。中東之戰。節錄自《消息演義》五十一、二回，載於阿英（編），**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頁242-282）。北京：中華書局。
- 黃愛華（2005）。春柳社演出日本新派劇劇目考略。**新文學史料**，3，頁141-

- 154。
- 楚永娟 (2010)。生命的挽歌—《孔雀東南飛》和《不如歸》的婚姻悲劇比較。**名作欣賞**，17，頁114-116。
- 楊少雲 (1909)。**不如歸行**。出版者與出版地不詳，上海圖書館藏本。
- 鄒波 (2009)。林紓重譯日本近代小說《不如歸》之底本考證。**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 (秋季號)，頁123-129。
- 鄒振環 (1996)。**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 劉崇稜 (1982)。德富蘆花與《不如歸》。**日本研究**，216，頁37-38。
- 德富蘆花 (2007)。**小說不如歸**。東京：岩波書店。
- 德富健次郎 (1929)。富士 (第二卷)。載於德富健次郎、德富あい，**蘆花全集** (第十七卷)。東京：蘆花全集刊行會。
- 歐陽予倩 (1990)。回憶春柳。載於**歐陽予倩全集** (第六卷) (頁146-179)。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 潘少瑜 (2008)。**清末民初翻譯言情小說研究—以林紓與周瘦鵑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 瀨戶宏 (2004)。**《不如歸》和《家庭恩怨記》比較**。載於**中國話劇研究** (第十輯) (頁48-58)。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Introduction (1905). In Kenjiro Tokutomi, *Nami-Ko: A Realistic Novel*. (Sakae S. & Edgett E. F., Trans.) Tokyo: Yurakusha, pp. v.-vii.
- Ito, K. K. (2008). *An Age of Melodrama: Family, Gender, and Social Hierarchy in the Turn-of-the-Century Japanese Nove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minz, L. & Tokutomi R. (1986). Pilgrimage to Tolstoy: Tokutomi Roka's *Junrei Kikō*. *Monumenta Nipponica*, 41(1), 51-101.
- Strong, K. (1970). Introduction. In Kenjiro Tokutomi, *Footprints in the Snow: A Novel of Meiji Japan*. (Strong K. Trans.) London: Allen & Unwin, pp. 9-46.
- Tokutomi, K. (1905). *Nami-Ko: A Realistic Novel*. (Sakae S. & Edgett E. F., Trans.) Tokyo: Yurakusha.
- Zwicker, J. E. (2006). *Practices of the Sentimental Imagination: Melodrama, the Novel, and the Social Imaginary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 Cambridge, Mas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